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国宝档案 / 方辉主编.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9

ISBN 7-80228-067-2

.国... .方... .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3977号



主 编: 方 辉

责任编辑: 杜 力 罗平峰

责任印刷: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 编 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 行 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传真)

网 址: www.nwp.cn (中文)

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邮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 权 部: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480千字

图 幅: 508幅

彩 页: 16页

印 张: 28.75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067-2/G·036

定 价: 4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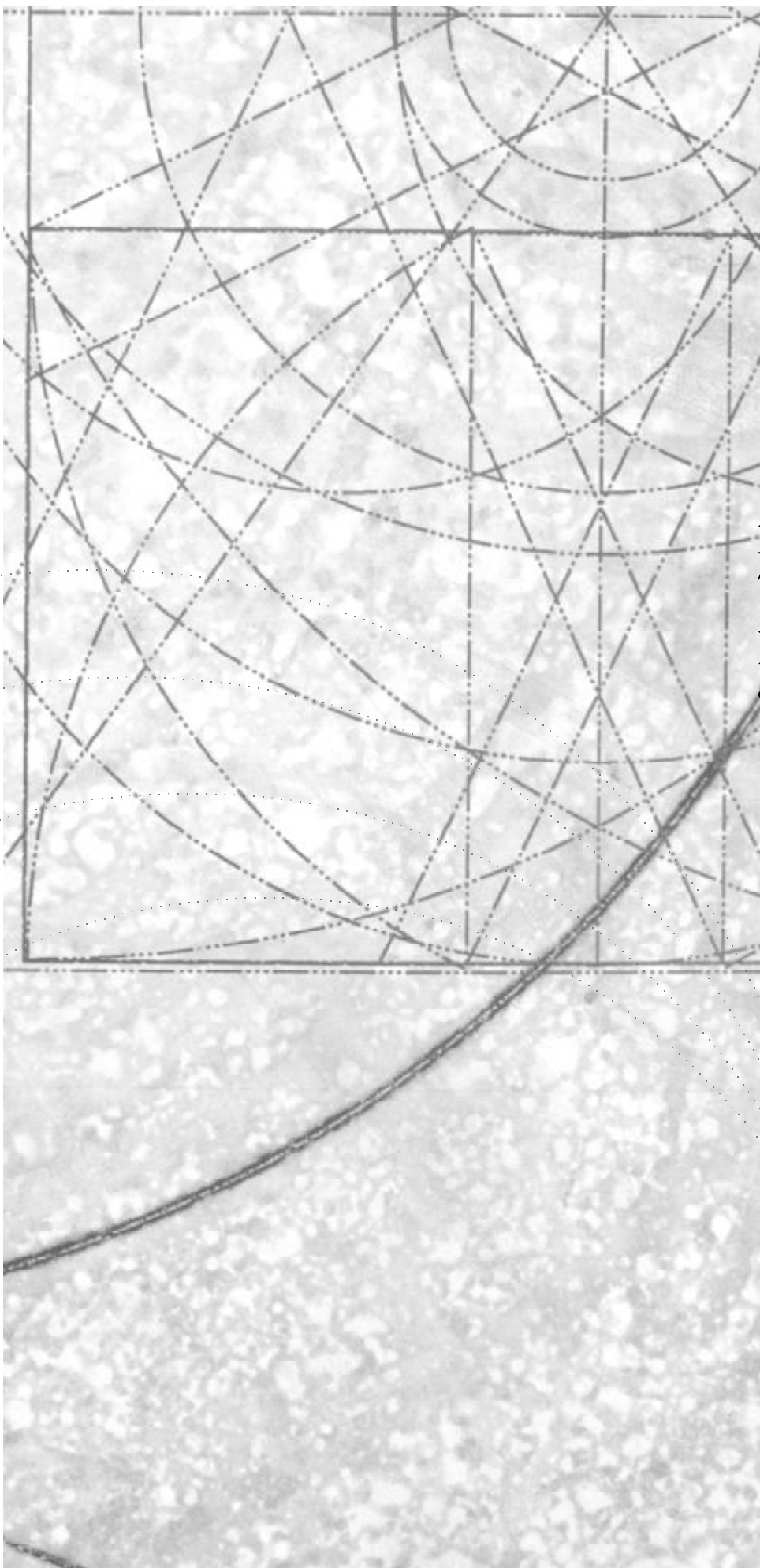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上篇

石破天惊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2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开始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图1）。1914年，安特生来到了中国，担任当时的政府矿业顾问，协助寻找煤田和其他矿产。当他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然后进入新疆，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内地前进，最后到达北京。20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仿佛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纯洁而且美丽……





——远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图一：安特生像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2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sala Univ.）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开始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图一）。1914年，安特生来到了中国，担任当时的政府矿业顾问，协助寻找煤田和其他矿产。当他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然后进入新疆，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内地前进，最后到达北京。20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仿佛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纯洁而且美丽，安特生却是无暇顾及这样的美丽的，因为他关心的不是这位少女的绰约风姿，而是垂涎于她祖先给她留下的丰厚遗产，尤其是物质的和文化的财物，至于矿产倒位于其次了。

事实上，自19世纪末开始，一些外国科学考察团和探险队已经在中国境内活动了，他们打着“科学考察”和“探险”的旗号，将他们齜齜的魔爪伸向蒙昧未知的少女，甚至以研究为名将无数的珍贵遗产据为己有！更有甚者，掠夺者将自己的非法所得举行展览大肆炫耀，从而助长了寻宝之风，使

落后的中国惨遭一场文化掠夺。

安特生的活动虽然同样以寻宝为目的，但是他最先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安特生同样对古生物学颇感兴趣，注重寻觅古生物化石和古人类遗迹。龙骨——这味古老的中药，其重要性也是西方人最早发现的。龙骨是由于人们对其本来面目认识不清而和传说动物龙联系在一起的，直到西方现代科学传入我国之后，人们才认识到，所谓龙骨，并非是龙的骨头，而是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又以哺乳动物骨骼化石最多，有鹿、马、羊、象、犀、牛等各种动物，它不但能够重建远古时期某个地区的生态场景，而且可以揭示那个时期人类的活动踪迹，因此发现龙骨的化石地点就显得相当重要。

安特生在没来中国之前，已经听说了北京中药铺买卖的龙骨中发现了人的牙齿化石，在来到中国之后，他就开始着手寻找化石的踪迹。他不但给在华的外国人写信，要求提供龙骨的出土线索，他甚至招募了一批技工，教以简单的化石知识之后，让他们分赴河南、甘肃、山西等地寻找化石，然而路途漫漫、山重水复，梦想寻觅的人类化石究竟在哪里？

命运之神最终眷顾了安特生，一次偶然的机会，安特生巧遇了化学家格雷戈·吉布，这位化学家告诉他北京西南的一个小山村发现了很多龙骨碎片，那儿一座小山叫鸡骨山，安特生在这里采集了很多龙骨，即古生物化石，但没有太大的发现。后来，安特生安排奥地利古





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到鸡骨山发掘，当地的村民看到他们的举动后，非常好奇，纷纷围观，等到村民得知他们寻找的是龙骨时，七嘴八舌的说，鸡骨山的龙骨少，龙骨山的龙骨多得多呢。这群古生物学家听从了村民的指引，来到了后来闻名世界的周口店龙骨山！

周口店的村落不大，它的东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西面和北面则是一座座古老的石灰岩小山，像鸡骨山、龙骨山等等。这些小山海拔很低，但形成年代非常古老，分布有距今4亿多年的奥陶纪石灰岩层。这些小山还蕴藏有煤、大理石等矿物，周口店的村民世代在此开采谋生，村民往往将裂隙两侧的矿藏开采殆尽，却将他们视为无用之物的堆积物完整的保留下来，从而留下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宝藏。

当时国际的历史背景是：达尔文于1871年正式提出了进化论中从猿到人的理论，此后科学家在世界各地寻找猿和人之间的缺环——猿人，1891年，荷兰人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首先发现了“爪哇人”，并且初步推算出其生活年代距今约50万年。这个发现大大鼓舞了科学家们，既然有“爪哇人”的发现，那么世界上其他地区一定也会有猿人的踪影，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寻找远古人类化石的热潮，“北京人”化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横空出世的，充满了神奇色彩，然而它的出生年代又注定它要遭受战火的洗礼，注定了“北京人”的磨难身世。

师丹斯基在龙骨山的发掘告一段落后，所有的出土品运往奥地利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他

竟然在这些龙骨中发现了两枚猿人的牙齿化石！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因为此前世界各地的猿人化石多发现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北京这样的温带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安特生更是欣喜若狂，他连忙调集人手，同时积极筹备发掘经费，最后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中



图二：“北京人”遗址发掘情况

国地质调查所也积极参与其事，并且详细签订了发掘协议，根据协议，发掘由安特生负责，加拿大古生物学家步达生主持工作，发掘品可以保存在协和医学院中进行研究，但所有的发掘品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所有标本不得运出中国。

1927年3月，周口店化石地点的野外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图二）。工作之初，步达生曾估计野外工作至多需要两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仅有几个月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后来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止，1949年之后，发掘工作得以继续进行，由此可知周口店这块远古人类的圣地，埋藏





着多么丰富的化石遗存!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起初并不顺利,由于缺乏发掘经验,裂隙遗存的堆积情况也不清楚,开始只是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主持工作的古生物学家们先后离开了工地,发掘任务交给了年轻的裴文中,由他全权负责。1929年的发掘进行得相当艰苦,裴文中在《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记录到:“步达生、德日进和杨钟健指示完毕走后,山中顿觉岑寂,而过起孤独的生活。山中工作,遇到第五层,非常坚硬,我们怎样崩炸,都不见效,因之觉得山中工作颇有‘鸡肋’之感。”坚硬的堆积层是碳酸钙渗入胶结的结果,难道猿人洞的发掘到底了吗?神秘的“北京人”究竟在哪里呢?

时间跨越到1937年,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蹂躏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终止,发掘所得品暂时存放在美国人开设的协和医学院实验室里,算是战火蔓延中的一块相对的安乐土,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迫于国际舆论准备参加到正义的反法西斯联盟中,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抵御美国的攻击,日本军国主义密谋抢先一步发动袭击,彻底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从而确立其海上霸权。在这种背景下,“北京人”化石的命运令人不安。现存的档案表明,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领导发掘的决策者们也冥思苦想,颇费筹谋。当时提出的方案主要有三种:一是就地埋藏,待战火结束后重新发掘出来;二是秘密离开北平,运往后方大西南;三是交给有外交豁免权的美国大使馆,携带至美国暂时保管。第一种方案因为缺乏合适的埋藏地点被否定了,第二种方案因为北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运出北平困难重重,只有第三种方案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经过与美国的协商,方案被批准,最终决定把“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暂存。

由于日本采用欺骗的手法,美国一直沉浸在和平的虚拟空间里,继续享受着好像无穷无尽的和平阳光。“北京人”化石的装箱工

作同样受到影响,进展工作缓慢。直到时局紧张,裴文中通知魏敦瑞的助手胡承志(新中国成立后任地质部地质博物馆工程师),准备装箱,然后将化石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总务长博文,由他们转交给美国使馆。装箱工作由胡承志和吉延卿负责,据胡承志后来回忆,装箱工作非常细致,所有的化石(包括珍贵的5个头骨)共装了一大一小两个木箱,详细登记了装箱清单,直到现在,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手中还保存着一份副本,其中包括裴文中、贾兰坡发现的5个头骨和山顶洞人的全部资料,仅“北京人”的下颌骨化石就有13件之多……

对于年轻的裴文中而言,坚持不渝给了他最好的回报,正是在周口店的发掘进行得举步维艰的时刻,裴文中选择了不言放弃,在1929年的秋季来临的时候,发掘工作继续进行,由于发掘的部分日渐缩小,应该即将到达洞穴堆积的底部,就在大家认为发掘行将结束的时候,洞穴突然向南延伸了……

这块向南延伸的缝隙后来被称为“猿人洞”,因为空间狭窄,清理进行不久,就只能容纳几个人从腰上系绳子下到里面,用汽灯照明进行工作,工作产生的土石必须随时运出,否则连容脚之地也没有了。后来空间矮小得连汽灯也无法使用,只好一手持蜡烛,一手清理堆积土层。也许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困难经历,使当年参与发掘的技工在时隔50余年之后,仍然对当年的出土情形记忆犹新!

历史会永远记着这个日子,1929年12月2日,下午快放工的时候,在层面上暴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技工连忙请裴文中过来,裴文中小心翼翼地将周围的泥土剔除,直到圆圆的东西的大部分暴露出来,他无法自抑地喊起来:“人头!人头!”人们纷纷围拢过来,大家谁也没有高声说话,仿佛担心惊醒“北京人”50万年的美梦。神秘的“北京人”终于向人们展现出庐山真面目!(图三)





消息传回北京,负责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步达生还将信将疑,“我接到裴从周口店发来的电报,说他明天将把他所说的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带回北平!!我希望它结果变成真的。”人们纷纷猜测议论,不是怀疑年轻的裴文中缺乏必要的鉴别人头盖骨化石的经验,就是怀疑裴文中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但是当裴文中对化石进行了简单处理后,乘坐周口店至房山



图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的长途汽车来到北平,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交到步达生手里,步达生进行了仔细的剔除,最终肯定了裴文中的发现,神秘的“北京人”首次向人们展示了它的绝代风姿!1929年底在北平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向全世界公布了“北京人”头骨化石发现的消息,这个消息迅速震撼了世界!其实后来的清理表明,在这之前的1928年的工作中,在猿人洞上方约3米处,已经出土了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方面由于碎裂,另一方面泥土包裹太厚,以致在现场没有发现,后来进行室内整理时才最终确定,而这已经是1930年的事情了,裴文中还因此自责,但熟悉田野考古发掘的人们都能了解,在当时的发掘技术水平下,确保发掘物的完整和层位明确已属难能可贵了,更何况“北京人”化石没有受损,这也许是“北京人”自己选择的重返世间的日期呢!

周口店的发掘因为这次轰动一时的发现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发掘工作也受到充分的重视,工作队购买了包括龙骨山在内的一大片山地,建立了临时的办公室,发掘范围也扩大了,更重要的是发掘方法方面的重大变革,是从过去单一的获取动物骨骼化石和人类遗骨化石转变为对人类居住地的遗迹、遗物的全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图四)。然而从1930年开始,发掘工作重新陷于怪圈,只见数量的增加,很少发现重要的化石遗物。1934年,一直给与周口店发掘鼎力支持和指导的著名古人类学家步达生因为心脏病突发辞世,对周口店的发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步达生不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直接领导周口店的发掘,但他从不自傲,总是把功劳挂在别人身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的科学家身上,而且他对研究“北京人”做出了贡献,根据周口店的发现,建立了“北京中国猿人”这个新属新种,奠定了





图四：“北京人”使用的石器

“北京人”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步达生去世后，他的工作由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接管，魏敦瑞后来入美国籍，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北京人”化石的研究工作，“北京人”化石在战乱时正是暂到美国找他避难的。1935年，裴文中赴法国留学，离开了周口店，发掘工作交给了另一位年轻人——后来成为“北京人”研究专家，至今还健在的贾兰坡教授，当时他只有25岁！但他用认真的态度和忍受孤独的能力，奠定了他在“北京人”化石发现史上的地位。

周口店工地发掘再次出现了山重水复的局面，很多学者耐不住寂寞离开了，贾兰坡依然坚持，命运女神最终再次眷顾了持之以恒的人！1936年的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挡不住人们工作的热情，在飘舞的雪花中，“北京人”再次出世了，而且不是一个，是三个！贾兰坡连夜打电话到北平，魏敦瑞第二天清晨知道后，“马上精神就紧张起来，先是找不到裤子，找到之后又穿反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个消息经过中外报纸刊登宣传，“北京人”再次轰动世界！

“北京人”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而凋零，人们迫于战乱，陆续离开了周口店，而这一别，竟是12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发掘工作在贾兰坡教授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发现了几颗人牙化石和一件“北京人”的下颌骨化石，人类学家据此复原了“北京人”的头像（图五）。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截至目前为止，还没

有发现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而此前发现的5个人类头骨化石，却不知已经流落何方？！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北京人”化石装箱后交给了协和医学院，然后转交到美驻中国使馆，和撤退的人员、物资一道搭乘军用专列驶往天津，准备在那里转乘“哈里逊总统”号前往美国，不料日美战事爆发，专列在河北秦皇岛被日军截获，“哈里逊总统”号也在海上遭日舰攻击搁浅，从此，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竟然不知所终！

如今，战争的阴影不再笼罩在人们的头上，但“北京人”化石却始终杳如黄鹤，各种传言纷至沓来：埋藏在天津说；匿藏日本说；阿波丸沉船说。各种争论让人们莫衷一是，但“北京人”化石的失踪是不争的事实，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创伤直到今天仍然刺痛，根据最新的报道，北京房山区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继续“北京人”化石的搜寻，热爱祖国珍贵文物的人们盼望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的条件变化之后，神秘的“北京人”也许还会有重返世间的那一天！（于秋伟）



图五：“北京人”复原像





——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

1987年考古学家在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一带发掘出土了一对蚌塑龙虎，距今大约为6500多年，位于墓主人的东西两侧。这座仰韶墓的墓主为一壮年男子，头南足北，四肢伸直，面向苍天。龙虎分左右而置，依照方位，恰和后世流行的“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相吻合。

天文学与考古学可谓有天壤之别，然而在豫北平原的这次偶然发现，却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考古学家们在黄土之下找到数千年前的星斗，如果真的如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古人将自己的骨骸与星宿埋葬在一起呢？而蚌塑龙虎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在发现和研究中，古墓的“天机”初现端倪……

一、二十八星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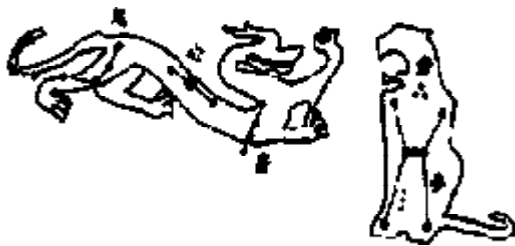
一切文明的历史几乎都是从神话开始的。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传世文献《尚书》中可知从三皇五帝时代起古人对星象的观测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体系中，被古人称为“帝星”的北极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远古时代，古人发现与北极星密切相关的是北斗七星，它终年不没入地平线，一年四季都能被看到。同时，北斗的位移明显而有规律，民间的一切节令，无不与它有关。所以，古人不仅把北斗七星作为时间的指示星，更以北极星和北斗星为基础，把整个的天区划为五个宫，也就是中宫和东西南北四个宫，中宫的主要星象就是北斗七星，也就是当时的极星，东西南北四个宫管辖着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星座”，是古人观

测行星、记录特殊天象的背景，也是绘制星图、制定历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主体部分之一。二十八宿在东、南、西、北四宫中各有七星。在农耕社会，我们的先人为了掌握季节农时，实现五谷丰登的理想收成，凭着观察恒星在夜空中的出没位置来预报四时，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天上的星象进行了形象的描绘。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古人将它们分别想像为一种动物，即东宫像苍龙，南宫像朱雀，西宫像白虎，北宫像玄武，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四象”。其中龙星座和虎星座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星座（图一）。《史记·天官书》载，“东宫苍龙”，“参为白虎”，龙虎两星座，一东一西，形象醒目，非常容易辨认。

1977年，湖北随县发现了一座战国早期墓葬，墓主是一个小诸侯国——曾国的一位名叫乙的国君，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墓



图一：龙、虎星座

葬中出土的青铜编钟，以其瑰丽的造型、雄浑的气势、准确的乐音轰动了全世界。

就在音乐史家和全国上下沉浸在编钟带来的惊喜之中时，细心的天文学家却从一只漆箱的盖面上发现了又一个巨大的惊喜。墓中出土五只样式相同、大小相近的衣箱，箱身





图二：曾侯乙墓漆箱

和箱盖分别是用整块木料雕凿而成的，外表髹有漆。

此漆木衣箱之珍贵，并不在于它的制造工艺与髹漆技术，而在于它的盖面上所书写的二十八宿名称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关于二十八宿的最早文字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一件重要文物。曾侯乙漆箱盖星图中左青龙、右白虎与二十八宿同时出现，既是古人对天象的观测，又象征着天地阴阳相通、生命永生的内涵（图二）。

1987年盛夏，仰韶文化聚落遗址被发现。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

许多奇迹，其中最神秘的是一座编号为 **M45**（**M**为考古学中墓葬的简称代号）的古墓（图三）。一位男性墓主头南脚北地仰卧于墓中，周围葬有三具殉人。特别奇怪的是，在墓主骨架两旁，有用蚌壳排列成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形态都颇生动，其头均向北，腿均向外。在墓主脚下，另有蚌壳排列成的一处三角形，旁边还有两根人腿骨。同时，在 **45**号墓室以外的同一层位上，另有两处也用蚌壳排列的龙、虎、鹿等动物图形，这两处图形和 **45**号墓排成一南北直线。

墓葬的年代无论是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还是碳十四的测定，都把它限定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

二、解密星图

在发现西水坡遗址**16**年后，冯时教授专程赶到濮阳，与当年发掘现场的负责人孙德萱一起来到现已是供水调节池的发掘现场。

经过现场了解后，孙德萱先生邀请冯时教授到存放西水坡文物的戚城文物仓库对残存的有关物件进行检视。

当年在发掘西水坡 **45**号墓时，由于种种原因，而出了不少意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使许多极为珍贵的信息自此变得不可复得。经过认真地观察、比较后，冯时教授发现了一个值得仔细关注的线索。在这个 **45**号墓虎的腹部的下边有一堆散乱的蚌壳，但是在这个墓的其他位置没有任何零乱的蚌壳，只能在这个虎的肚子底下有这么一堆蚌壳。那么在曾侯乙墓的漆箱盖的腹部下边也有一个类似于火形的这么一个图像，这两个线索把这两个图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西水坡的**45**号墓的这个图形和曾侯乙墓漆箱盖的



图三：西水坡龙虎墓墓描图





图形,它们所反映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因此考古学家确定它就应该是一个星图。

整个45号墓还有三殉人,这三个人在墓葬中处的位置非常有意思,非常特别。在注意这些特殊的安排的同时,科学家还考虑了这些殉人的年龄,经过骨架鉴定,他们都属于十二至十六岁的男女少年,而且他们的头部有刀砍的痕迹,均属非正常死亡。

这些事实促使人们不得不将墓穴表现的这种奇异现象与《尚书·尧典》的记载加以联系,在这部书里,古人当时已有一个很完整的文化观念,认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由四位天文官分别掌管着的,即所谓的“分至四神”。

这个墓中的三个孩子分别象征司掌春分、秋分和冬至的神。后来,考古学家们又找到了代表司掌夏至的那个神的殉人。

墓葬中呈现的一切意味着当时的古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回归年,也就是说,最原始的历法很可能已产生了。同时,也证明中国的早期星象在六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体系,尽管这些答案的象征意义十分强烈。

这个墓主人的地位一定不会很低。他虽然没有瓶瓶罐罐,没有日常的生活用具,但是在他的墓葬中随葬的是整个的星斗,是整个天上的星斗,这个表明了是他生前所掌握的职系的一个特点。

或认为是“五帝”之一的颛顼。

被称为“颛顼之墟”的濮阳地区,在上古时代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及其部族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古称“帝丘”。在宗教兴盛的帝丘时代,颛顼帝实施了“绝地天通”的重大举措,大大推动了天文科学的发展,创制了中国第一部天文历法“颛顼历”,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贡献,颛顼死后葬埋于帝丘濮阳。

或认为是“三皇”之一的伏羲。伏羲到濮阳之后获得天命而成为天子。

大约在七千多年前,在天水一带生活的,属古西羌族的伏羲部落成长起来,为了扩大其生存空间,大概在距今六千六百到七千年前之间,从天水秦安出发,沿渭河而下,然后沿黄河而下直抵古雷泽的西岸。伏羲部落集团之所以选择了濮阳作为其基地,是因为水域辽阔的雷泽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水产品,又是一个阻隔与东方的东夷各氏族集团发生直接冲突的隔离地带,而西面的黄河又是一条抵御西部各氏族部落的天然屏障。在迁移过程中不免与其他氏族集团发生冲突、交流与融合。伏羲之所以能识别天球上的星象符号并因而画卦作易、作九九之术、立周天历度等,可能与他沿途看到的同期文化如西安半坡人制作的钻有极富数学规律孔眼的陶器和人面鱼网纹彩陶盆边沿上的八个方向的符号所受到的启发有关。

相隔了漫漫6500年,墓主人的身份究其事实真相,多凭了传说与推测;然而护躯卫穴的星宿龙虎赫然醒目,并传至后世!

三、青龙白虎

古人认为,虎是“阳物”,龙是“阴物”,阴阳相合而万物相生,虎与龙,这样一对陆地之尊和水中之王,它们跟随墓主左右,显示了墓主人的威风凛凛,非同一般。后世堪舆家不得不感叹:“青龙蜿蜒,白虎驯府,以护卫区穴”!

发掘之时,蚌龙引起了重大轰动,被誉为“中华第一龙”,以龙的传人为美的人们在惊喜感动之余,纷纷猜测其内涵意义;而另一



图四:西水坡蚌虎墓描图



侧的蚌虎则相对显得寂寥许多。然而，龙毕竟是人们臆想中的一种灵异之兽，是现世动物的一种完美组合，而虎则是鲜活的、生动的、现世的，却比任何一种现世的动物都多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蚌虎虎头微低，圆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替如行走，虎虎生风，大有下山之猛虎的威仪，“中华第一虎”亦当之无愧（图四）。

龙、虎以雷霆之势走入了先人的心灵，现世的猛虎携了灵异的蛟龙，龙吟虎啸，让人们避无可避。在古老的一本卦书《周易·乾卦》中说：“云从龙，风从虎。”龙飞于天，虎行于地，虎与龙结合在一起成为吉祥昌盛的象征和美化权威的典型形态，构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族风情。如虎添翼，既是天作之合，若风云之独霸天下；龙争虎斗，又是世态常情，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虎与龙经常这样地相携出现。龙虎是星宿神，担负着守卫天宫的责任，是天帝的守护神，当然也是人间君王自己的守护神。虎踞龙盘，是帝王尊贵的宣言，夏商周秦，不少器物上都是龙虎相携。夏有龙旗虎历。商代出土文物中有龙虎尊，尊颈有二龙盘旋，尊腹正中镌刻一虎双身食人花纹。周代则有龙虎节，《周礼·地官》记载，朝



图五：长沙马王堆汉墓漆绘棺

廷派去巡视诸侯的钦差，到江河湖海之滨的，“泽国用龙节”；到高原的，“山国用虎节”。曾侯乙墓漆箱上的那对青龙白虎，中间书写一斗字，围绕斗字一周是二十八星宿的名称。无独有偶，长沙马王堆汉墓朱地彩绘棺盖上刻有龙虎斗题材的纹样（图五），应是取其龙虎相携，保护和导引死者灵魂升天之意吧。汉墓画像多有龙虎图案，用以保护死者，为显示其神性，还着双翼。蜀道之难，几尽隔绝外面天地，浪漫的巴蜀先人，却奇情恣肆，龙虎翩跹戏壁（图六），姿势优美之极，恍然让人进入虚幻的仙家世界，在一种不真实之中，又觉得



图六：四川汉画像石龙虎戏壁拓片





理所当然。

然而南北朝以后，龙虎作为皇权守护神的地位逐渐被双龙和外来的狮子所取代。只有在民间，随着道教的发展，虎的地位未曾动摇，道观里至今还有青龙白虎二将护卫。龙虎相和相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诸如龙腾虎跃、龙行虎步、生龙活虎、龙骧虎视、龙蟠虎踞、龙

略虎韬、龙潭虎穴、藏龙卧虎等成语脍炙人口；今天陕西娃娃过满月馈送的虎头龙身鱼尾礼馍，正是祈愿龙虎图腾对氏族子孙的繁衍抚育保护之意。

令世人震惊的濮阳西水坡 M45 号墓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幸运，它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嵇柏红）





——红山文化探秘

大约五千年前,仿佛是醍醐灌顶般地,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像是巧合,却又是千古难解的谜。而在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被毁灭了以后,只有华夏文明将它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么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呢?

在国人传统观念中,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黄河流域,中华文明从黄河的摇篮里孕育出来,然后,再传播到华夏各地。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定论。这只能怪我们的史学家们,2000多年来,他们一直被始皇帝修建的长城遮住了双眼,忘记了在

长城以北,有中华民族更古老的家。

上个世纪初,终于有考古学家跨过了长城,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一片褐红色的山峦上,当地人称它为“乌兰哈达”,也就是红山。

神秘的积石冢、奇特的女神庙和熠熠生辉的玉器……,把那些一心探寻华夏文明源头的目光从黄河长江生生地拉到了长城以北。五千年以前,红山人为什么能够跨进文明的门槛?他们为什么要建造积石冢、女神庙和大型祭坛?对龙的虔诚崇拜寄托着红山人怎样的希望?精美的红山玉器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沉潜数千年的红山文化慢慢浮出水面,让人们一探究竟。

一、走进红山

1906年的一天黄昏,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走进了建于清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他是应喀拉沁第12代亲王贡桑诺尔布的邀请来王府的。

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他的心思却放在考古调查上。将近一年的奔波和调察,他发现了一些环绕着石头的古墓。这些古墓,其中就有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最终,这位日本学者还是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等地区,出现了法国神父、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的身影。桑志华在中国北方行程近5万公里,足迹甚至到了西藏东部。在鸟居龙藏流连走过的红山一带,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



图一:玉猪龙





22处。但法国人桑志华还是与红山文化考古重大发现擦肩而过。

美丽的红山仿佛是有灵性，或许它在等待着什么？

1930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回国。此前他已经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关于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回国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长城以北，希望能够改写那儿没有古文明的历史。

然而，日本人的炮声和所谓日本考古团体的掠夺惊扰了红山的安宁。时至今日，在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中，依然能读出当时的动荡。梁思永伤感地写道：“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东北4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九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在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当时，年轻的佟柱臣并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积石冢。

神秘的红山文化，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若隐若现后，终于破茧而出，在1955年得以命名，而此时，梁思永已因病去世一年多了。在红山文化命名后的几十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也就没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随着满城汉墓、曾侯乙墓和秦始皇兵马俑等考古重大发现的问世，远在塞外的红山显得有些苍凉和寂寥，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人并没有停止踏上去赤峰的列车。

二、解读玉雕龙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一座5000年前的古墓，古墓主人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经过研究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图一）。它体蜷如环，环首似猪，圆眼有皱；通体抛光，造型生动。消息传出，引起轰动。此时，赤峰市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想到了13年前曾征集到的一件玉龙。



图二：玉雕龙

1971年8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修梯田时发现一个石洞，从石洞底部，他摸出一个“铁钩子”。当时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就用绳子绑住“铁钩子”，拖着在村子里玩耍。几天后，“铁钩子”拖出光泽，竟然是玉龙！翁牛特旗文化馆用30元钱征集了这件玉器，但却把它当成一件普通文物锁进箱子里。此时的红山玉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刻意重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人把它们鉴定为商周时期的文物，或者说成是战国或汉代的装饰品。

或许，这件锁进箱底的玉龙也可能是和牛河梁遗址发掘出土的玉猪龙属于同样珍贵的文物？贾鸿恩立即赶到北京，请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鉴定。

经鉴定，玉龙终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





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图二)。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1000**克,身体呈**C**形,因此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双眼突起,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方格网状纹,脊背有长鬃,但无足、爪、角、鳞、鳍,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沉寂了数千年的玉雕龙终于再露峥嵘。渴望了解玉雕龙的人们,再一次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塞外的红山。三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这件玉龙基本一致。

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关于龙的最初原型的种种设想便应运而生,或者是恐龙,或者是很多动物的组合;还有的说,龙的原型是风云、松树甚至昆虫……。而红山文化玉雕龙的龙首却像猪,这个谜,缠绕在学者们的心中。

2003年,考古队员来到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村落,被誉为“华夏第一村”。兴隆洼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前,是红山人的先辈。同年**10**月,考古人员清理完**6**个储藏食物的窖穴后,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大灰坑。当考古人员将灰土清理干净,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了:由石块和陶片组成的一条距今**8000**年的**S**形龙静静躺在那里,龙头部摆放着一个野猪头骨。

无独有偶,在赵宝沟文化遗址发现的一件距今**7000**多年的陶尊上竟有一幅“透视画”,画中动物是被神话了的猪、鹿和鸟。画面运用夸张手法,优美细腻、栩栩如生。其中猪的形象蜷曲做腾飞状,被称为中国陶器上的第一具猪龙。

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为揭开龙首之谜找到了科学依据。

兴隆洼猪首龙的出土,说明龙的原型源

于动物,龙一开始就是一种人文的、综合性的合体动物,猪首龙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由于当时狩猎采集经济占主要地位,而野猪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动物。因此,崇拜猪首龙,是先民们祈求猎物繁盛和狩猎活动成功。而野猪、鹿和鸟等也同样是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人狩猎的目标和赖以生存的给养,他们怀着虔诚的心,把这些动物精心描绘在陶尊上加以膜拜,祈求丰衣足食。几乎同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神秘“玉猪龙”出土。“玉猪龙”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着皱纹。专家通过对猪的面部观察对比,认为这些玉器是猪首造型。

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再到红山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它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了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被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一直到汉代,猪在某些时候依然是龙的代名词。汉武帝刘彻出生后,景帝即赐名为彘,彘就是猪,隐含了景帝对这个儿子的喜爱和深切期盼之情。

三、揭秘红山玉

当人们认可了玉雕龙,大量精美的红山玉器随之迎面扑来。红山人生活的区域远在塞外,红山人的墓葬习俗,既不是水葬、风葬和火葬,也不是其他史前文化流行的“土坑竖穴式”墓葬,而是在墓的顶上堆满石头的“积石冢”。所谓的积石冢,就是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垒砌石块,中心部位经常是砌一座大型的石棺墓,边缘部位,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最后在石棺墓的上边再积石,就是堆放石块,从而给人一种山陵似的感觉。

时间的长河把这些环绕古墓的石头冲散开来,进入寻常百姓家,没有人问它们的来源。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庄稼地,庄稼地边上散落着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石块,很久以来,人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用处。他们把这些石块当成当年农业学大寨修建梯田时的遗留物,或者把它们看作是废弃了的





象征着吉祥的敖包。甚至有人就把石块拣回村里，拿它砌院墙垒猪圈。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些石块底下，埋藏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每当考古队员们打开积石冢内的中心大墓时，刚才还是湛蓝的天空，立即变得乌云密布、雷声滚滚。

考古队员们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只用玉器随葬，大型石棺墓随葬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工艺讲究。小型的石棺墓里，不仅玉器数量少，有的根本就没有玉器随葬。

原始人类在迎来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经走过了几百万年漫长的发展道路。从人类诞生到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

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这个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处在对自然物简易加工的初级阶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离今天4万年至1万年之间，随着制作石器工艺的提高，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类中，逐渐萌发出审美意识。到了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就从众多的石头里面，挑选出美丽而温润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带的装饰品。于是，就出现了玉器。

但玉器从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学者普遍认为，在神秘的“积石冢”里，拥有玉器的墓主人就是5000年以前，红山部落里的首领兼巫师。5000年以前，红山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便虔诚地乞求于神灵的帮助



图三：绿松石鸟饰





和庇护,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从而部落里也就有了巫师,巫师成了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们又是部落里的精神领袖。

在众多出土的红山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类玉器,除了C形玉雕龙和玉猪龙之外,还有玉鸟(图三)、玉蚕、玉鸮、玉蝉蛹、玉龟等等。诸多动物造型的玉器出现,意味着什么呢?

有人认为,如此多的动物造型玉器出现,说明红山人对动物的崇拜。因为红山人相信,有些动物能为他们免除灾难,带来好运。

玉蝉,是红山文化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动物造型的玉器。且红山文化的玉蝉中有羽翼的数量较少,而大多数是蝉蛹的造型。蝉在红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的幼虫生活在土中,化成蝉蛹后不食不动,就像死了一样,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树梢,蜕变成能飞的知了。红山人用蝉蛹造型的玉器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蝉蛹一样蜕变复活。

在古代,龟和鳖被视为长寿的吉祥物,是人们崇拜的神。中国的民间早就有了“千年龟”和“万年鳖”的说法。红山人把玉龟、玉鳖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龟神和鳖神在另一个世界给予死者以保护。对于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的玉鹰,有的学者推测,它的出现,寄托着红山人向往着能够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自由翱翔,达到通天接地的愿望。

神秘的红山玉器,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想像空间。红山玉器的出现,在史前的中华大地上,无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

四、聚焦女神庙

没有人会预料,拥有大型积石冢和精美玉器的红山人还会带给人们什么样的惊喜。然而,苦苦追寻着红山人足迹的考古队员们又分明在企盼着什么。

按照常识,史前文化的墓地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与相关的地面建筑遗迹相伴。红山先民们在5000多年以前的建筑物是否相应而生?于是,在1983年的秋季里,考古队员把目光放在了寻找红山人的建筑遗址上面。

没有人会忘记那历史性的一刻,当年,主持和组织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的郭大顺,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时间,在期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整个工地悄然无声,连空气仿佛也停止了流动。只有小铲子和小刷子,在剥离泥土时发出的声音在沙沙地响着。渐渐地,一个人的面部轮廓,开始显现,接着,头颅、眼睛也开始显露出来。中国远古女神,在地下埋藏了5000年之后,终于露出了她那端庄而又高贵的容颜(图四)。

女神用坦然而又镇定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5000年以后的人们,面对着考古队员的惊讶,



图四:牛河梁女神像

